

*Tarimian Hu*  
*Farhan Tongshu*

杨 镰 陈宏博 主编

探险与发现丛书

# 亚洲的脉搏

亨廷顿 著

【美】

新疆人民出版社

「你這人，怎麼就愛管閒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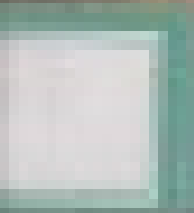
「這事關乎人命，我怎麼能不管？」



# 北 湖 的 秘 境

北湖的秘境

北湖



50.51  
248

亨廷顿 著  
【美】

# 亚洲的脉搏

探险与发现丛书

杨 镰 陈宏博 主编

*Henning Hu*  
*Asian Dongshu*

新疆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的脉搏/(美)亨廷顿著;王彩琴,葛莉译.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6

(探险与发现丛书/杨镰、陈宏博主编)

书名原文: The Pulse of Asia

ISBN 7-228-06235-3

I. 亚… II. ①亨…②王…③葛… III. 亚洲-游记 IV. K9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5093 号

## 亚洲的脉搏

瑞典 亨廷顿 著 王彩琴 葛莉 译

---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码 830001  
印 刷 新疆农科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 000 册

---

ISBN 7-228-06235-3/K·918

定价:14.00 元

## 一边是绿洲,一边是沙漠

(代序)

杨 铤

绿洲,《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是“沙漠中有水、草的地方”;沙漠,《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则是“地面完全为沙所覆盖,缺乏流水,气候干燥,植物稀少的地区”。绿洲与沙漠是对立的概念,区别在于水、植被的有无。在沙漠中,绿洲代表生命,绿洲是人类的栖息地,人类文明萌生的伊甸园;与绿洲相反,沙漠代表死亡,沙漠是生命的禁区,人类文明的炼狱。众所周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疆塔里木除了绿洲就是沙漠戈壁。但并非人人都曾想到过:塔里木的沙漠究竟是怎样形成的?绿洲在沙漠环伺下如何生存?沙

漠与绿洲之间在什么条件下将发生位置转换？人类的载体——绿洲家园会不会彻底沦为沙漠死界？美国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思·亨廷顿教授的《亚洲的脉搏》便是凭借自己在塔里木的艰难曲折的探险经历，为上述问题寻找着可能的答案。

由于他的探险过程充满思索和发现，尽管亨廷顿两次来中国新疆考察远在上个世纪之初，尽管他不如斯文·赫定、斯坦因知名，但他所做的工作和所写的《亚洲的脉搏》一书，至今仍然有特殊意义。

按照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成例，一般 20 世纪的中亚探险家在完成一次旅行之后，总是出版两本书，一本是学术考察报告，另一本是纪实性的游记。一本提供学术界参考，往往也是对设立课题者或出资方的总结、交代；另一本面向广大读者，是写给一切对此有兴趣的人看的。两者之间，不是学术专著与科学普及读物的关系，实际上它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书。亨廷顿在 1905 年 3 月至 1906 年 4 月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他的第二次中亚科学考察，他的课题是研究中亚气候与文明的演变，而专著《文明与气候》便是本课题的直接学术成果，这本《亚洲的脉搏》则是专门为普通读者写的塔里木探险记。按现在出版物的分类，它属于纪实文学——一个由自然科学家所写的人文作品。以往偶见为掩饰自己的浅薄无知，而故意贬斥人文著述甚至典籍之为。其实一本有真知灼见的游记（包括古西行记）与自相矛盾、专作欺人之谈的“专著”，并不能等量齐观。前者至少能给我们一些实感和启发，后者则只在标榜自己。重视《文明与气候》这类

学术著作,但并不偏废《亚洲的脉搏》这类探险记,是可取的态度。20世纪前期,出版过中国西部游记的外国人主要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探险家、传教士、记者、旅行家、外交官,甚至是文物贩子、负有不可告人使命的密探。中国读者读过不少考古家、史学家、探险家……从人文角度记述西部的书籍,这些书籍着力探讨亚洲腹地的人文历史等问题:沙埋古城、绿洲兴衰、古道风情……曾给了读者许多启示。而《亚洲的脉搏》一书则好比是在同一个舞台上转换了一个视角:沙埋古城、绿洲兴衰、古道风情……成为一个地理学家深化研究课题——气候与人类文明发展变化关系——特设的布景。换句话说,《亚洲的脉搏》是用人文例证深化自然科学课题,它写到沙埋古城,却不从历史考古出发,古城沙埋是气候与人类文明关系的遗迹;描述绿洲兴衰,那是用生动的事实演示人与环境的依存关系;介绍古道风情当然也并非猎奇,而是推测一种文明和它的特殊内涵如何形成,并如何延续至今。

总之,读过《亚洲的脉搏》,你关注的问题是:这古老又年轻,丰饶又贫瘠,单调又奇异的亚洲腹地——新疆塔里木——有怎样的过去,又必将会有怎样的将来。而它的作者在八九个月的时间里,从绿洲走进荒漠,又从荒漠返回绿洲,他如同一个在平衡木上倾情表演的体操王子,举手投足之间,体现出自由的有限与有限的自由;他就像一个维吾尔族传统杂技“达瓦孜”(高空走绳)的大师,因一线相悬而顾盼生辉,却不曾越雷池半步。他的一边是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他的另一边是绿洲,是沉积着古老文明的、牵系着东西方进步幅

的丝绸之路绿洲带。他寻找的是绿洲/沙漠互相置换的规律,他体验的是几千年文明史转嫁给生态环境的沉重负荷。

读过《亚洲的脉搏》,你就像刚刚亲历了绿洲/沙漠的切换,刚刚突出重围从死界回归红尘,感受到了即将醒来的中亚大地的悠长呼吸,而亚洲腹地奔流不息的内陆河就是它沉稳自律的脉搏。

亨廷顿对中亚的科学考察从1903年延续到1906年,进行了四年时间。这四年又分成两个段落。

1903年夏天,作为美国卡耐基学院彭帕里探险队成员,亨廷顿第一次到亚洲腹地进行了野外实地考察。他们从伊塞克湖畔的普尔热瓦尔斯克市启程,工作区域是中国新疆喀什噶尔和俄领中亚城市奥什之间人迹罕至的山区,重点是帕米尔高原的气候与地理条件。亨廷顿与美国著名地理学家戴维斯教授在天山纵深处的柯尔克孜族牧人中生活了3个月。他不但学会了柯尔克孜语,粗通维吾尔语,还与柯尔克孜人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关系。关于这次工作,他出版了《1903年的中亚考察》、《重逢在亚洲腹地》等书。1903—1904年间,他还随彭帕里考察队考察了波斯(伊朗)和里海盆地。

1905—1906年,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资助,亨廷顿再次深入亚洲腹地,这次工作区域完全在新疆,重点仍然是气候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1905年3月18日，亨廷顿和同事巴雷特来到“世外桃源”克什米尔。他的历时一年多的中亚地理考察将从克什米尔开始。在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略做安排，便前往喇嘛教的沃壤拉达克。从5月中旬到6月中旬，亨廷顿的驮队用35天翻越了喀喇昆仑山，进入中国境内。在和田河上游喀拉喀什河河谷，他第一次见到了喀喇昆仑山的背面(北面)的大地，见到了中国的游牧民。站在海拔16700英尺的桑株山口，他深深为亚洲的心脏——塔里木盆地所吸引。开阔的视野、壮观的景色，使见惯山川风貌的地理学家感到震惊。他曾将昆仑山峡谷比作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

1905年6月到1906年2月，他在塔里木的南、东两侧工作了9个月。和阗(和田)、策勒、克里雅(于田)、尼雅(民丰)、车尔臣(且末)、卡尔克里克(若羌)……，除深入昆仑山区，发现了恰哈等遗址，到达了大小金矿，亨廷顿基本上是按照昆仑山麓的古绿洲带一路前行。实际上他总是在步斯文·赫定、斯坦因后尘，乌宗塔提、达摩沟、丹丹乌里克、安迪尔、尼雅、瓦石峡、楼兰故城……，一般来说除了恰哈还有米兰，他自己没有发现新的古遗址。尽管只要能够做到，他总是千方百计，不愿遗漏探访历史遗存的机会，但他显然与斯坦因等人迥然不同，他关心古迹，但兴奋点从来也不在寻找文物上。古城、古迹，在他看来纯粹是气候与人类文明关系的例证。

他对塔里木区域这个地理单元特别重视，这显然受到了斯文·赫定、斯坦因的影响。但他始终坚持用自己创制的地理概念“罗布盆地”称呼塔里木。斯文·赫定和斯

坦因不约而同地将塔里木叫做“亚洲腹地”，他却认为“亚洲心脏”这个代称更形象、更有诗意。

1906年2月23日，在塔里木度过了夏、秋、冬三个季节之后，亨廷顿进入了吐鲁番低地。2月，也许是吐鲁番最宜人的月份。但亨廷顿在吐鲁番只停留了近20天，就结束了这次考察的野外工作。3月中旬，他抵达新疆省会——乌鲁木齐。4月7日，从塔城出境，经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回国后，他获得了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院科研基金，整理考察成果的工作得以很快进行。1907年7月，《亚洲的脉搏》就顺利完稿并及时面世。

在20世纪的中国西部探险家中，亨廷顿在新疆时间不是最长的，他的路线也不是最艰险或最有开创意义的。但他的专著《文明与气候》在欧美地理学界潜移默化，影响深远；他的《亚洲的脉搏》内容生动曲折，涵盖面广，思考问题通脱透彻，分析历史演变过程与发展走向鞭辟入里。将塔里木的历史命运归结到人类与环境关系这个横贯古今的宏大题目之下，《亚洲的脉搏》是开山之作。

塔里木的9个月，为推究绿洲群变迁的过程，亨廷顿一个一个“追踪”着目标：固拉合玛、恰哈、新老达摩沟、乌宗塔提、尼雅、安迪尔、瓦石峡、米兰……他依循条条源于昆仑雪峰、养育了山前绿洲带、潜入亚洲腹地沙漠的内陆河：策勒河、克里雅河、尼雅河、牙通古孜河、安迪尔河、喀拉米兰河、车尔臣河、米兰河，最后是塔里木河与孔雀河，

辨认着气候与文明的“年轮”。塔里木绿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断改变面貌，开始使他感到困惑不解，最终却启发他将这此生彼息的发展变化作为一种规律来总结。他研究的课题是“文明与气候”，他的结论远非定论，然而他的尝试却丰富了人们对塔里木—中国西部—丝绸之路的认识。

亨廷顿是科学家，但他相当关心历史考古。事实上，他是20世纪西域探险史上第一个报道策勒南部昆仑山中的神秘古迹恰哈古城、第一个实地考察米兰遗址的人。但他对恰哈的关注，始终保持着将焦距调整在昆仑山水资源与人口怎样处在平衡状态这个位置上。本书的重要章节——第十一章“尚未被探索的罗布盐泽”，以米兰作为开篇。1905年圣诞节前后在米兰遗址，他注意到汉唐时代的米兰比他到来的20世纪初养育着更多的人口，绿洲面积要大得多，也繁荣得多。当时米兰是新阿不旦居民夏季“游耕”的地方，一年所获，仅仅够15—20户罗布人食用。“这里的土地每三年只能耕作一次”，毫无疑问，以前米兰的生态环境、气候植被一定与20世纪初大不相同。而作者依据自己对米兰故城、寺院、烽燧、驿站、民宅的观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米兰遗址除了是古迹，“更重要的是验证了一个关于不同历史时期气候演变的假设”。

亨廷顿到达的米兰，一般认为就是《汉书》记载过的楼兰王国重要垦区——伊循城。古代遗址米兰故城和今天的绿洲——兵团三十六团米兰镇，我都比较熟悉。人们注意到古代良田肥美的伊循垦区早已是荒漠死界，几乎寸草不生。而人类在这一区域里不断变换聚落位置，

凡挪一个地方,就留下一片荒滩。正是这个巨大强烈的反差,使亨廷顿的研究课题超出了考古调查,力图具有超前的意义。

罗布荒原是亨廷顿关注的重点。本书第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作者写到了米兰古今环境的置换和伴随着环境变化而产生的绿洲“挪动”,写到了穿行罗布泊时陷入盐沼的奇情险状,描绘了沼气中毒的厄运,这些都是前所未闻的细节。在阿提米希布拉克(六十泉)即将步赫定后尘前往楼兰故城,可前来饮水的野骆驼裹挟他的役用骆驼逃逸了。寻找骆驼的段落,是西部探险记中有代表性的段落之一,时隔近百年读之,还使我产生了恶梦难醒般的感受。就罗布荒原探险考察而言,亨廷顿是斯文·赫定与斯坦因之间的过渡人物。对罗布荒原,他显然不如赫定熟悉,甚至也不如斯坦因了解。但他笔下的罗布荒原探险,确实惊心动魄,如身临其境。

即便在罗布荒原这样的地角天涯,人也是亨廷顿关照的主体:人与人——外来者与罗布人,人与骆驼——役用的与野生的,人与荒原,人与历史,人与无人……,如果离开了特定的环境,人就是失群的人、无助的人、惶惑的人、迷途的人,只能束手待毙。在罗布人的首府新阿不旦,他与从未吃过一口馕或其他面食的固守旧俗的罗布渔人相处得不错,但他力图进入罗布人主观世界的努力却失败了。他并不了解罗布人当时的生存状态。看得出来,他对柯尔克孜族牧人颇具好感。在第五章“天山深处的柯尔克孜人”中,他特意写到牧人日用品简单实用,没有易碎的、不便于搬运的家什,并指出这是由迁徙不定的

游牧生活方式决定的。——这算不得创见。但第十二章“干涸的河床和秃山”中，当亨廷顿一行路经一个古遗址时，他仅凭遍地碎陶片便认定这是农业时期的聚落，游牧民显然用不着如此之多的陶制器皿。在这里，如果没有第五章对当时柯尔克孜族牧人家什的铺垫，他的判断便不具备说服力。然而正因为这个遗址的年代相当早，足以说明塔里木河下游早在纪元之前已经有了发达的定居农业。

作者写了塔里木河下游英库勒—蒲昌城—喀喇库木—铁干里克等地在 19—20 世纪之际的垦荒。开垦者的成功与失败，以他的视角被记录下来。由此他联想到了远在 200 英里之外的楼兰故城，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显然，在现有灌溉条件下，在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下游地区，甚至在远离上游的喀喇库木，长期养活一定的农业人口是有可能的。在距下游 200 余英里的楼兰故城，由于蒸发严重，河水的盐分越积越多，情况一定更糟。中国人垦荒努力的完全失败，并不是因为治理无方，或发生了战乱，也不是因为缺乏追求土地的移民，而完全是因为河水的极度盐化造成的。

第十三章“罗布淖尔的兴衰”，他综合了自己的考察进一步说：在干旱的塔里木，环境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水量多少的变化——他认为这个变化是客观规律，不在于沙漠的收缩扩张，不在于植被的生死，而在于水质的恶化，在于河流不再是原来的那条河了！

正是脉搏不能照常输送血液，逐渐导致了亚洲心脏的梗阻和坏死！

毫无疑问，亨廷顿的见解有待科学实践的检验。我认同的是他看问题的角度。他的意见毕竟是近百年前的一家之言，当然有时代的局限，是非对错，自有后人评判。而学问历来总如积薪，必定后来居上。亨廷顿的塔里木探险考察之行是20世纪西部探险史的一个独特的“章节”，他的见闻丰富了我们对于西部的了解，他的着眼点确实能为我们认识塔里木绿洲沙漠的变迁，提供有益的思路。

亚洲的脉搏仍然在有力地搏动。亚洲需要一个坚强可靠的心脏。

#### 四

《亚洲的脉搏》第五章“天山深处的柯尔克孜人”有这样一段插曲：

我的目的并不是研究植物，但是也许有必要在此列一张（我在天山见到的）植物表，是我碰巧看见并记录下来的。这些植物在罗布盆地东北部山间低坡上随处可见，取之不尽，而在欧洲和美洲却需要人工培植。……鉴于有很多人反对认为中亚是欧洲主要种族的发源地的理论，上面所列植物表就很有意味了。

这个观察大有深意。人类文明的历史进展证明，今

天的庭院花卉,最早一定是由野生引进的;今天的园圃水果,最早一定漫山遍野都是。如果欧洲名花郁金香在中亚只有野生种,那无疑说明中亚是它的祖籍,人们是从中亚山野将它移植到庭院之中的。新疆的野生苹果、野生核桃、野骆驼……对人类文明发生发展的意义,也正在于此。这个插曲看似写来毫不经意,然而它不但是点睛之笔,也是亨廷顿考察特点的体现。

地理学家亨廷顿对中亚文明与气候的研究,实际就是对人类文明与生存环境关系的研究。

法国史学家、艺术批评家丹纳的《艺术哲学》是我曾反复阅读的一本专著。当然,丹纳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的观点受到过责难,并非定论。事实上我推重的不是他的结论,而是他研究问题的方法和眼界。

读过《亚洲的脉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是亨廷顿用他的实践拓展了我们的思维空间,扩大了我們受到屏蔽的视野。

最后,应该略作说明的是:收入“探险与发现丛书”第二辑的《亚洲的脉搏》,是第一次译成中文。所据英文本是1907年第一版,原名 *THE PULSE OF ASIA*。

本书由王彩琴、葛莉两位女士翻译。具体分工是:自序和第一章至第十章,由王彩琴译出;第十一章至第十四章,由葛莉译出。由我统稿并略加注释。

在编译过程中,曾得到过奥其尔、郭颖杰的协助,特此致谢。

## 自序

这本书记录了在亚洲的一次旅行，目的是要说明人类在和自然环境之间、和气候变化等历史发展之间的地理学上的关系。这方面前人已提出很多我们并不陌生的假设，而且还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披露。如果我这本书提出了某些被人们认可的观点，那是由于它综合了迄今为止各种相关的假设，并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贯通起来。协调已知的有大量事实为证据的理论，不可能产生于一个学科，而只能是由多种学科构成的，如：地理学、气象学、考古学、民俗学以及历史学等等。当然，这本书的观点还需要进一步修改，但是，如果本书推进了科学界反对在地理学和历史学研究方面的经验主义倾向，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在这部书中会经常提到戴维斯教授，本书正是题赠给他的。是他使地理学从经验主义上升到理性科学的高度。在美国，有一半的地理学家——当然也包括我在内——正是通过戴维斯教授，才意识到地理学作为一门



独立学科的意义。我们大家对戴维斯教授深表敬意，而我对他的感激与崇敬又远甚于此。因为，正是通过他，我才有机会在亚洲度过了四年后，又得以在亚洲腹地考察了三年。返回美国之后，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院研究基金使我有可能会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写这部著作和几篇论文。与戴维斯教授亲密合作达六年之久，我深深地感到他确实是一位极优秀的教师，最理想的旅行同伴，又是一位令人敬重的畏友。他曾阅读了这部书的手稿，并且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避免了我的错误。本书的所有成就都有赖于他，在此，我难以尽述对他的感激与崇敬。

还有另外两位朋友，查尔斯·李·齐格勒夫人和赫伯特·阿·吉布斯先生阅读过这部手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尤其是在文学形式方面，而这正是科学工作者的弱点。对他们二位，我深表谢意。我还要感谢罗伯特·李·巴雷特先生，他是我在旅行初期的伙伴，在引言中我会提到。在印度，通过罗得克我们得到了政府最优厚的待遇。在此向他表示感谢。美国旅行家总是期望从英国伙伴那里得到帮助，这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在中国境内，我们自始至终得到关照，而据说这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要特别感谢中国政府。在俄罗斯和西伯利亚，我同样得到政府的礼遇。那时我归心似箭，最令我感激的是虽然处在革命动乱之中，我们仍被充分信任而允许自由行动，直到离开华沙进入德国境内时才用到我的护照。